Globethics Repository



更正教神學與深層生態學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OBB Jr., John B.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8 03:54:0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13

更正教神學與深層生態學*

約翰・柯布（John B. COBB Jr.）
李駿康 譯　賴品超 校

人類中心主義的失敗

若對比於原始宗教的背景，所有「較高等的宗教」都是人類中心的 (anthropocentric) 甚或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tic) 的。他們是人類的拯救的宗教，並且都是集中在個人的拯救。此拯救與物質的安好斷絕關係，並因此與物質世界中的改變無關。

這些大傳統全部都敲出其他音符來。在這本書中，我們是強調這些其他的音符號。當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在生態問題上的歷史性失誤，便正確地重新恢復這些其他元素，並且嘗試去給予它們一個中心的角色。這些努力將會作出重要的貢獻，但最好在開始時先承認，一個真正的生態意識是更清楚和有效地出現在狩獵和採集的社會中，多過在我們的傳統中。當我們尋找深層生態學的宗教版時，

---

* 本譯文譯自John B. Cobb Jr, "Protestant Theology and Deep Ecology", in: *Deep Ecology and World Religions: New Essays on Sacred Ground.* David Landis Barnhill and Roger S. Gottlieb , ed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 213-228.此文經授權翻譯及刊登。——編注
Reprinted from *Deep Ecology and World Religions: New Essays on Sacred Ground* by David Landis Barnhill and Roger S. Gottlieb (Eds.), by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001,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l Rights Reserved.

它們正是我們所應當轉向的。

雖然所有世界各大宗教都有這弱點，作為一個更正教基督徒，我不得不馬上承認，更正教神學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基督教作為一個整體強調個人與上帝的內在關係，但東方教會直至現在仍正視上帝與整個創造的關係這更大的場景。縱使是西方教會，在教父及中世紀時期教會的教導中，也包含了社會和自然世界的整體。東方和羅馬大公教傳統，都有資源在今天去回應我們對生態危機的新意識，這是需要獨立處理的課題。我作為一個更正教徒，會限制自己於普世更正教的處境，正如這篇論文的題目指示的一樣。

令改教家感到不安和導致他們與羅馬破裂的傳統教導的特徵，是頗為狹窄地關於在個體救贖中，上帝、教會及個人所扮演的角色。結果是，改教家的著作都是壓倒性地集中於這些課題上。再者，他們相信，那些他們認為在這些課題上的歪曲，大部分是源於那更為廣闊的哲學傳統併入了基督教的教導；拒絕了這些，會導致仍然繼續集中於個人救贖的問題上。加爾文 (Calvin) 環繞上帝和人的靈魂來建立他的神學，而那更廣闊的創造所提供的只是背景和處境。

這種情況在十九世紀變得更差。跟隨着康德 (Kant)，更正教神學家把自然的世界放棄了，給了科學，以及將歷史作為他們唯一的領域。他們常常強調道德和靈性領域，以及集中注意力在獨立的個體上。創造的教義，先前是將基督教思想連繫於自然的整體，於此被再解釋為表達個人對上帝的根本依靠。

當然，更正教不是一個完全一致的運動，並且很多更正教徒在十九及二十世紀都繼續透過及在自然中尋找上帝。他們當中很多人認為，創造是意指自然的整體，而他們對自

然的驚嘆，往往是建基於他們對它的創造者的信仰。的確，這種對自然的欣賞，在一般更正教徒的虔敬中，比起神學家的康德主義，更為顯著。但因為它沒有得到理論上的表達，它對教會領袖的影響力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康德派進入了神學後有非常大的影響。那些準牧師在課程中學到的，是認為對自然的注意是情緒化的和不相干的，他們的力量應該被引導向處理人類的情況。他們所可以選擇的只不過是對人類救贖的不同理解：社會歷史的 (sociohistorical) 或來世的 (otherworldly)、心理上的 (psychological) 或實存的 (existential)、道德的或神秘的 (mystical)。

我自己在神學上的導師，並不是康德學派的。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裏我們學懂了，神學是不應該脫離對自然世界的研究。我們學習到，自然與歷史的進程之間是既有不同又是連續的。有些教授稱他們自己是新自然主義者 (neo-naturalists)，是為了強調這種與康德學派神學的對立，他們中間有些人提出要深深地改變西方的情感。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學習在這更廣闊的神學場景中運作，以及在這處境中去表達我們獨特的觀點。在這更廣闊的場景中，眾多可能性的範圍大部分是由巴特 (Karl Barth) 的新加爾文神學 (Neo-Calvinist) 和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的基督教存在主義 (Christian Existentialism) 所界定。對我們來說，連接到布特曼是遠較為容易的。在布特曼的存在主義神學裏，焦點落在個人的抉擇上，而個人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達到了巔峰。雖然我們有時候會投入與布特曼和他的追隨者進行辯論，他對課題的陳構，再加上更廣闊的新正統的脈絡，都傾向於塑造我們的議程和我們反省的題目。在生物圈中有甚麼發生，根本不會在我們的雷達上顯現。

至少，我的哲學神學正是如此構成的。在六十年代，我寫了一本書名為《基督教的自然神學》(*A Christian Natural Theology*)，表述我尤其在懷德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的著作的影響下所吸收的、而非康德派的哲學神學。但「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 並沒有在基督教歷史中被定義為關於自然的反省，雖然它經常包括這些。它意指在理性的界限內的神學，是獨立於訴諸超自然的啟示。我所處理的題目，是那些更正教神學裏典型地會有的：「人」和上帝。

我寫這些是要去指出，縱使更正教神學中那些為我所用的哲學和神學資源給過我一個十分不同的選擇，我還是如何深深地被其主流特徵社化 (socialized) 為人類中心主義。這一直維持到六十年代末，環境危機的嚴重性開了我的眼睛，使我開始意識到這個吊詭。在那個時候，我了解到我的老師並不像我一樣的眼瞎，但他們那種對自然世界的開放並沒有影響到我，我想這樣說是妥當的：在他們的學生中，我並不是不尋常的。

當我讀到懷特 (Lynn White) 著名的論文《我們的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時，我立即看見，至少就我的思想所識取的基督教傳統而言，他是正確的。他將他的攻擊伸延向整個西方基督教主流，雖然，事實上，前康德神學的人類中心主義，並不是如後康德神學那樣極端，並且，在早期教父的時期和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神學家，比起改教運動者，對自然更為包容；不論當時或是現在，我也認為他是對的。

懷特自己指出，傳統包括了其他的聲音。他特別提到聖法蘭西斯作為另一種視域，這更適合我們現在的需要。他像個更正教的平信徒般寫作，要求改革，並提議如何成就改革。

西方基督教一直是人類中心的，而在多個世紀以後更是變本加厲，這對更正教來說尤其確切。正是這更正教為人類中心和個人主義哲學、倫理學、經濟學和政治思想的興起，提供了最重要的處境。這種種加在一起，那些與個人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一致的實踐便得到支持，這些實踐已改變了地球的面貌。不管其他各大宗教的傳統在這些方面有何缺失，這仍是我們的失敗，要承擔起令這星球變差的主要責任。

進程神學的進路

幸運地，基督教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現象。對我來說它最強大的力量是其悔改的能力。我們更正教徒已經有很多要悔改的地方，並不單止與自然世界的關係。悔改並不是指初步的悔咎，雖然某些悔咎無疑是正確的。它意指改變方向，因此也包括對我們的神學反思。

對於更正教徒來說，最容易的悔改形式是重新找出被忽略了的聖經主題。最明顯與我們現在的關注相關，而又一直被主流更正教神學所忽略的聖經主題，就是創造。聖經一開始便論述上帝如何創造天和地。在十九世紀更正教神學家將這個故事驅逐至邊緣，是為了強調上帝與以色列人的立約關係，並且也是為了避免與生物學家爭辯有關進化論的問題。

現在這故事已被重新發現，並不是為了科學上的資料，而是為了清楚確認整個自然世界對於上帝是重要的，並且在上帝眼中是看為好的。上帝所重視的，我們也應當重視。更正教不再看自然僅為一個讓人類上演戲劇的舞台，而是重新發現那更合符聖經的異象，就是人類的整個歷史都在自然的情況中發生，並且是和自然連結在一起。

發生在自然世界裏的，既有內在的重要性，又對人類有廣大的工具性的重要性。

這些教導藉洪水的故事再得以增強。雖然特別是有關挪亞和他的方舟的故事已經被邊緣化為一個美好的兒童故事，但是今天我們可以欣賞到，這些故事對人類歷史與自然環境間互相結連和互相依賴的關係作出何等的強調。它特別顯出上帝關顧到物種的保存，或用現今的講法——生物多樣化 (biodiversity)。

把康德式的鏡片拿掉，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聖經中對整個自然的關注和自然與人類的互動，是持續不斷的。即使是終末論的遠象，就是對最終救贖的盼望，也包括自然世界在內。被慶祝的救贖，不只是多少個人的靈魂離開世界，也是世界本身 (當然包括了人類) 的救贖。更正教的聖經學者已廣泛地重新閱讀和重新解釋過了。

我是以作為一個特定類型的更正教神學家——「進程」的神學家而說話。芝加哥大學神學院多年來都是這種比較近自然主義 (naturalistic) 的神學講論的主要地方。進程神學家在創造論思想的再發現中起了領導的作用。在普世教會協會中，作為生物學家和進程神學家的查爾斯・畢爾查 (Charles Birch) 為環境的可持續性得到官方的確認 (這是一九七五年在奈羅比[Nairobi]的一個中心關注) 提供了重要的領導作用。自此，在更正教圈子中，自然世界在神學上的重要性得到官方的確認。

普協於一九七九年在麻省理工學院 (MIT) 舉行了一個名為「信仰、科學與未來」(Faith, Science and the Future) 的聚會，在那裏畢爾查扮演了另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就是闡明進程神學在更正教的脈絡中的特徵。與會者分成不同的小組去討論不同的事項，例如核能、教育、科技轉移以

及經濟。會議策劃人承認，當時應該有一組是討論關於潛存的神學問題。他們稱這組為「信仰與科學」。畢爾查提議再加一組處理關於「自然、人與上帝」。由於得到一位東正教主教的支持，這個建議便被接納了，而本人最後便主持那一組。

兩個論題之間的不同顯示着康德式與非康德式神學間的分野。在康德的影響下，絕大多數的專業的更正教神學家，都已墮進現代哲學的偏見，就是以認識論來定義課題。信仰和科學是兩種認知的方法；因此，問題就是它們如何被關連起來。

另一方面，進程神學辯稱，縱使知識論有本體論的假設，它並不提供一個中立的、基礎性的出發點。將我們對真實世界的信仰加以整理，與把焦點放在我們如何知道那些我們所知道的，同樣重要。兩者皆無法超越我們那永遠都只是部分的觀點，並且這種超越實在的做法是沒有可能的。這是指進程神學家們對我們關於自然和關於上帝的理論的開展，是以上帝及自然的真實性獨立於它們如何被人類所認知；這也就是意指，我們承認我們所有的確認是具有推測和假設的特徵。

西方思想的主流，包括更正教神學的主流，是更安於保留以知識論為焦點。因為知識論的焦點是內在地以人類為中心，於是這主流便沒有恰當地克服人類中心主義，縱使它再次把信仰連繫於科學。從進程神學的觀點來看，對聖經的思維方法的再發現幫助了克服這主流的人類中心主義；然而，除非先直接面對這知識論的開始點的問題，這改進將不會得到全面的影響。

這些評論指出，更正教神學正在改變中。進程科學家希望它將會有更多的改變。任何社會歷史的運動都是緩慢

地改變着的；並且，這些與終極關懷有關的事情其改變可能會特別緩慢。這裏有一危險，就是對終極的意識被結連於現存的信仰及實踐，而非連結於對終極委身的對象。

儘管如此，改變的確出現了。更正教主義肇始於基督宗教的教導回到聖經權威，以對抗那從一千五百多年的傳統中發展出來的教義和實踐。更正教徒強調人類對上帝的啟示的解釋的可誤性，尤其是加爾文派堅持改革不可能是一次就完成的，它必須是一個繼續的過程，因為聖經的權威對更正教徒來說超過任何對聖經的詮釋或某些哲學的委身，聖經詮釋的改變會導致教條和實踐的改變。不論多少，總可在聖經中找到以創造作為整體的關注。原則上更正教徒必須為他們對這關注的忽視而悔改，而這悔改是要被遠遠推前的。

從進程神學的觀點來看，改變又需要在其他基礎上去接受。聖經自己指示我們朝向新的真理。基督徒不論從任何渠道接觸到智慧，也應該抱開放的態度去學習。這是指我們應該吸收從自然科學中學到的東西，並據此修改我們的教導。總體來說，我們已經做到了這個。這是說我們應該對來自心理學和社會學範疇的新理解抱開放的態度，而在這些領域中同樣已出現一些改變。近來，我們已經受到重大的挑戰，認識到我們所承繼的，包括大部分是在聖經中的男性的觀點；而我們已經開始嘗試開放自己去面對女性的不同感覺和睿識。這已經證明是更具爭議的，但縱然如此仍有更多爭議發生。我們現在亦面對着一項挑戰，就是要向其他宗教傳統學習，包括原始宗教。

聖經的文本本身要求我們要對自然世界的了解作更多的改變。另外，聖經又間接地要求我們從自然科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女性主義及其他宗教傳統去學習有關方面的

知識。把自己限制於聖經文本和傳統從聖經那裏所抽取出來的，並不是真正地忠於聖經。

進程神學及深層生態學

我們不能隨便把神學的環境保護論 (theological environmentalism) 理解為「膚淺的生態學」，那通常被理解為承繼了人類中心論的範疇以處理某些實踐上的生態問題。對現時更正教關於創造論的思想來說，核心性的問題就是要認識到對我們的智性、文化和宗教遺產進行再思的重要性。就此而言，它是一種「深層生態學」的形式，在進程生態神學中更是如此。

儘管如此，在那些以「深層生態學家」自居的人中，有些傾向於將自己與更正教神學家、包括更正教進程神學家，分別開來。我們將會說明五類有關的傾向，並說明更正教生態神學，尤其是進程神學，為何和如何走向一個不同的方向。無論這種神學是不是「深層生態學」，還是另一種不同形式的「深層生態學」，都只是一個專有名詞上的問題。但為了簡單些，我會用「深層生態學」這個詞去表示那些確立這個傳統的人所意指的。

作為一個更正教神學家去寫作，我單只會描述更正教的觀點，也會為它舉證。這並不是指在所有的分歧點上，我都相信更正教徒是對的而深層生態學者是錯的。的確，我相信，兩種進路皆有其位置，並希望兩者可以互相尊重。

首先，那些引領着為「深層生態學」作定義的人，經常將注意力引離人類關係中的正義和解放的課題。更正教徒浸淫在聖經中，對此並不能接受。尤其是從進程神學家的觀點來看，我們的關注是能夠和應該延伸至人的物種以外，達至上帝的創造作為一整體的福祉。但進程神學家同

意其他更正教徒所主張的，這必不能減少對人類的個體和集體的關懷，並且對人類的關注將集中在那些最無能力去滿足自身需要的人身上。

我在這裏的意思並不是指所有「深層生態學家」對人類的受苦和壓逼漠不關心，只是說那些被稱為「深層生態學」的，通常都是從大地的情況出發並由此而轉移至人類和其成員的福祉。這是一個應全然受到尊重的理性的方法，但這不是基督教的。

基督徒典型地從那有需要的「鄰舍」出發。基督徒的愛很多都是以一種非常個人主義的方式來表現。但是很多基督徒都認識到，鄰舍的條件是受到一些更廣泛的系統所限定——就是政治、社會、經濟的系統。因此，大量的注意力都是放在這些系統上。

如我們所見，直到最近，所有這些仍是局限於人類的領域。先於上文提及的悔改，基督徒的習慣、尤其是更正教的習慣以及那些被康德的哲學所塑造的習慣尤甚，很少注意那些鄰舍所居住的更廣泛的生態系統。對於一般的更正教徒，尤其是進程神學家，這種將關注的領域轉為包含這系統，是以作為對鄰舍的愛的伸延而出現。

當這出現時，有兩種立場都是可能的。基督徒可能會承認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因為人類依靠它。當普世教會協會確認基督教應該關注人類社會的可持續性，正如他們關注社會的參與性和公義，這正是他們所必須預設的全部。在那些有意或無意地受康德強烈影響的人中間，這是主要的立場。

但基督徒可能承認其他受造物組成的生態系統在它們自身並對上帝都是有價值的，而這正是進程神學家所特別強調的。因此，非人類受造物的幸福的重要性不單是因為

它們對人類有貢獻。這種情況從普世教會協會 (WCC) 在言辭上由人類社會的可持續性轉移至創造的完整性中已有所暗示。舉例說，今天人們會阻止物種走向絕種，不只是因為某些對人類有價值的東西可能會失去，亦因為每一物種對其本身的成員都有價值，並每一物種對上帝都有價值。這引向深層生態學的方向。

儘管如此，人類仍然是受到極力強調。自一九八二年，普世協會的整體口號就是「和平、公義、創造的完整」。協會知道在這些目標之間有時會有張力。例如「和平」意指武力衝突的消失，但努力去達致公義卻不時會破壞和平。幾乎所有基督教徒皆確認應當盡力通過和平的方法達致公義，但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得承認某些時候為了公義的緣故使用武力是比其他真實的選擇更可取。

與這篇論文更直接相關聯的是，在為人類尋求公義和為其他受造物尋求供應之間，事實上可能會有張力。舉例說，為要給非洲動物保留住處，貧窮的人有時候會被拒使用他們所需用的土地。在那些反對以動物作實驗的動物權益組織，和支持通過這類研究方法去尋找治療愛滋病的方法的葯物研究者之間，也同樣有張力存在。

基督徒最自然的回應是找出一些方法，能同時符合雙方的需要，而不是在它們之間作出取捨。但假如必須要作一個抉擇，將會預計到的是，絕大部分更正教徒會相當一致地選擇貧窮和有疾病的人類。對有需要的人類鄰舍委身，並未因對整個創造的委身而有重大的妥協。

因此，在人類存有短暫的好處和自然環境的健康之間，有時候是有張力的，取捨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到現時為止，大部分的基督徒仍然充分以人類為中心，會傾向支持達到滿足人類當下的需要。從進程神學的角度來看，主

流更正教群體需要走得更遠，並且應更明確表示，人類應該預備為其他動物的緣故而作出犧牲，但我們同意我們應該小心，這些犧牲並不是要強加在那些已經貧窮和無力的人身上。

另一方面，將人類和其他受造物的幸福作對立二分，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更多的時候，破壞某些東西的也破壞其他的，幫助某些東西的也幫助其他的。如果我們關注自然世界的未來，我們必須關注和平，正如關注公義和參與人類事務；又如果我們關心人類社會中的和平、正義和參與，我們也必定關注自然世界的健康。

對進程神學家來說，那種言論仍是將人類與自然分開得太遠，它反映了康德二元論的影響，而非更深遠的基督教諸傳統。聖經中有關創造的語言，統合了人類和自然，並且我們現在所關注的，是整個的創造，包括它的整全性。

第二，雖然基督徒視人類為創造其中的一部分，我們仍然看人類在受造物中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人類和其他受造物——因為方便的緣故，我將會稱之為「自然」，雖然這會引起錯誤的印象以為人類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之間的分別仍是重要，不單因為我們特別關注公義和解放，而且還因為我們需要去反省關於我們自己獨特的角色。深層生態學視人類之種 (human species) 只不過是眾多生物中的一種，在某程度上盡量減少了考慮人類對整體受造的特別責任。

當然，人類之種是眾多生物中的一種，對更正教神學來說也是如此。但對那些受聖經所塑造的人來說，人類之種在整體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並且因而對整體的幸福有責任。支配的真實性，在我們來看，是由真實的處境所確定。的確，我們對絕大多數其他物種所作出的整體性的

支配，已在真正令人不安的方式中實現了。今天，仍只有在人類決定要保留的小片荒地才仍有一些適合居住的荒地。事實上我們一直以來都糟糕地行使我們的主權，此一事實呼籲我們現在要負責任地行使主權——而不是假設我們並沒有主權。

深層生態學者正確地指出，對主權的討論，正是一種已經構成巨大傷害的態度和情感的主要部分。他們尋求一種不同的靈性，在其中，管理和控制的想法，將會由對互相結連、親屬關係和尊重他者的意識所取代。他們珍惜讓事物如其本身所是地存在，而非改變它們成為適合我們的。從進程神學家的觀點來看，他們在這方面全是對的。

但基督徒不能接受那些深層生態學家有時從這裏所得出的結論。地球的命運事實上是控制在人類的手中。這明顯地是真實的，除非人類的行為方式有根本性的改變，我們是被命定有一個可怕的結局。同樣真實的是，只有當根深蒂固的態度又或者我們根本的靈性有所改變，這種改變才出現。但是這改變並不應該離開那對事情的發生的責任。

一個運用主權的重要方法，是從有可能作出操控的地方退出——讓荒野獨自存在。但這是去履行人類的責任，而不是那些深層生態學家有時或會呼籲的放棄支配性的角色。對我們來說，只有一種負責任的關注的心態，才或許有可能去抗衡那仍佔主導的剝削心態。

第三，深層生態學經常把自然或大地說成是神聖的。進程神學家肯定，這是一有價值的反動，拒絕將其他受造物僅僅當作達到人類目的的工具。我們也相信，對於那些受啟蒙運動人文主義的影響、習慣將人類的身位說成神聖的更正教徒，這種將神聖伸延至所有受造物，是有益的。若要在人類和大自然之間劃清界線，也就是假設了神聖和

世俗的分離，這是錯誤的。如果我們把神聖與內在價值連結，又將世俗與工具價值連結，我們便能認出，在這個區分中，人類中心主義就已經有了這破壞性的影響。因此，進程神學家能夠為到對所有受造物的神聖性感覺不斷增長而加以慶祝。

雖然如此，從一個歷史的更正教角度來看，這種語言是危險地誤導的。嚴格來說，神聖和世俗之間的界線更應畫在上帝和受造物之間。將任何受造物放在神聖的一邊，會陷入偶像崇拜的危機中。對包括進程神學家在內的很多更正教徒來說，正確的說法是道成肉身的、內在性的或聖禮式的。上帝臨在於世界當中——在每一受造物當中，但沒有任何受造物是神聖的。每一個受造物都有其內在的價值，但是稱它為神聖會陷入將絕對價值加於其身上的危險。這是錯誤的。

深層生態學家一般來說並不是有神論者。的確，有很多證據指出，他們認為大部分形式的有神論都是把注意力導離自然世界，並將之集中在個別信徒與一位超越的他者的關係上。集中在這他者中的神聖，是導致對自然解咒 (disenchantment) 的一個主要原因，亦因此帶來對自然無情的剝削。否定這超越的上帝，就給自然重新神聖化開啟了一條新的道路，這制止了人類在與其關係中的狂傲。

在這裏，深層生態學家們的立場同樣是完全值得被尊重的，他們對於甚麼已經發生和甚麼能夠發生的掌握，都是正確的。但他們所作的改動，卻是更正教徒，包括那些在進程神學的傳統中的人，所不能跟隨的。並且，從更正教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危險的看法。

一旦某些事物被看為神聖，對相對價值或重要性的判斷，將會停止運作。在更正教當中，我們在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 那裏已經看到某些類似的想法。他尊重生命的教條，預先排除了對不同的生命形式的相對價值的判斷。另一方面，在實踐上他往往作了這種判斷。他為了他的病人健康的緣故而殺死細菌；為了照顧一隻雀鳥康復，便用小魚來餵養牠。在這些行為裏，他表現了常規的更正教價值。

但對大多數更正教徒來說，並且明顯是對進程神學家們來說，將某人藉以行動的原則陳構出來，是有一定的好處的，因為這樣就能對他們作出評論和討論。宣稱人類的生命是神聖的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很難為那些屬於現今稱為生命倫理的範圍內的問題下決定。假若所有人類的生命是神聖的，我們如何陳構出一個基礎，讓我們在必須作出決擇時，去決定該拯救哪一條生命呢？

對很多更正教徒，並且也肯定是對進程神學家們來說，看來比較好的是，肯定只有上帝是神聖的，但上帝的靈是臨在於每一受造物。所有受造物都有內在的價值；此外，它們對上帝和對其他受造物都有價值。承認這說法，有助抑制我們為了狹窄自私的目的隨便對其他受造物進行剝削。但它同樣容許我們去思想關於不同受造物的內在價值，它們對神聖生命的貢獻，以及它們在整個生物系統中的重要性。在這個反省的基礎上，我們能夠決定我們所面對着的多種需要中，哪一項最為迫切。

第四，在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回應中，深層生態學尤其反對所有關於價值分級 (gradations of value) 的判斷。這些分級通常以價值層級 (hierarchy of value) 來定義。層級除了被聯想到權力或權威外，又被聯想到分級；因此這種語言的使用，已經進一步強化了深層生態學者的反對。作為一個有時候說到價值層級的人，我承認深層生態學的批判是適切的。

若說更正教徒作為一整體，又或通過他們的制度的表述，已經明確地處理了這個問題，可能是說過了頭。我在這裏的評論，多過在此論文以外的其他地方，是將這些既定立場的含意加以投射出來，多過是明顯的確認。此外，他們是來自一個進程神學家的觀點而這樣作的。

進程神學家們不能放棄對價值分級的肯定。所有的受造物都有內在的價值，但有些比起其他的有更大的內在價值。這就是說，某些受造物的內在生命比起別的更為複雜、更深刻和更豐富。殺害一條鯨魚比毀滅一些浮游生物，失去了更多正面的價值，並且帶來更多的痛苦。當然，這是一個人類的判斷，但這並不使人類的判斷成為我們所應該避免的那種以人類為中心。對於我們與其他受造物的關係中行動的結果，我們被要求運用我們最佳的判斷。

在此，人類中心主義的指控經常會得到這樣一個佐證支持：就是指出我們常常斷定那些較為像我們的受造物，比起其他與我們有更大分別的，有較大的價值。這種對我們如何作判斷的解釋有一定的道理，但其相似性並非如此而成為判斷的基礎。我們的確知道，人類是可以有異常廣闊和深刻的體驗；因此，這種人類的經驗通常具有巨大的內在價值。我們認為，其他在相關方面與我們相像的受造物，同樣有豐富的經驗並因而有巨大的內在價值。

但是我們的判斷是關於其他動物可能有的經驗的豐富性，而不是關於牠們的經驗與我們自己的經驗的相似性。因為我們有限的想像力，這判斷可能被種種相似之處所扭曲。我們可能低估了一隻海豚的經驗的豐富性，也可能高估了一隻猴子的經驗的豐富性，因為後者更加像我們。但這會是一個在判斷中出現的錯誤；這不是內置於判斷的基礎中。

此外，我們認為，上帝的經驗比我們所有的經驗都豐富得多、無可比擬。假如在判斷其他動物的經驗的內在價值時，是基於相似性，這就是相似於上帝對萬有完全的包容，並創造地將此整合於一個新的整體中。一種經驗若能更多的包含世界，那相比起另一個包含較少的，就有更大的價值；一種經驗若能將此複雜性整合為一個有效的統一體，則勝過一個在不協調中被遺下的經驗。

為方便帶出第二個重點，我選了鯨魚和浮游生物作為例子。內在價值是頗為不同於為他的價值或為整體的價值。如果鯨魚絕種，在海洋中的生命仍會繼續。牠們在海洋生態系統中扮演着一個角色，但這不是一個必要的角色。假若浮游生物消失，整個系統將會崩潰。

在這實際上的互相依存中，某些受造物和種類比其他的受造物和物種，對於整體的幸福來說是更為重要，在此實際上的互相依存之外，還有一種存有論上的互相依存。我們每一個都是由與所有他者的關係所構成。縱使我們對其他的東西毫不知曉，在他們身上發生的都會經某些途徑影響着我們，不論是多麼輕微的影響。用保羅的話來說，我們是互為肢體 (members one of another) 。

此外，我們也要考慮其他價值。對進程神學家來說，多樣化 (diversity) 本身是有價值的。因此，一個物種的消失的重要性，並不止於個別成員的消失或對生態系統的破壞。確實，因為在某些程度來說，受造物的多樣性對所有經驗的豐富性皆有貢獻，但對那包容一切的神聖經驗來說，更是決定性和普遍的。

我的意思是，為了受造物的緣故而作的負責任行為，是必需建基於複雜的對價值的種種判斷，而這些正是被拒絕承認價值分級所禁止的。由於作為更正教信徒，我們願

意承擔那些所發生的事情的責任——有時這會被稱為管家職事 (stewardship) ——對於我們作決定時所依據的基礎，同樣需要去反省。

第五，作為一個進程神學家，我認為必需去解答一個問題，而對於這問題，目前只有很少更正教機構清楚地作過討論，就是對個別動物的關注，尤其是對那些被認為有重要的主體經驗的動物。

普世協會在談論受造物的整合性時所用的措辭，可解釋為承認我們對受造物的幸福的關注不應該僅僅是人類中心的，其他物種對上帝來說也是重要的。至此，協會仍沒有明確地表達對個別非人類動物的受害的關注。

深層生態學者大都沒有關注到個別動物受害的問題。他們關注到生態系統的健康，但卻導致他們接受動物受苦是事物的自然運作。人類有份將痛苦加害於其他動物身上，並沒有甚麼特別的重要性。關注「人道」對待家畜，對很多深層生態學者來說似乎都是情緒化 (sentimental) 的，他們所關注的主要針對野生動物，以及人類如何正確地配合野生的秩序。

作為一個更正教的進程神學家，我在這方面對我的更正教徒同伴和深層生態學家們都持同樣的批判。我也分享他們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和組成這系統的物種的關注。但是對於人類將大量不必要的苦難加害於無助的眾受造物伙伴身上，是沒有理由可以漠不關心的。

假若我們需要在保存一個能存活的生物圈和減少對家畜的受害之間作出選擇，我會毫無疑問地接受以前者作為優先考慮。但若只因為一個課題不是最重要的就把它忽略，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從一個進程神學家的觀點來看，我們的眾受造物伙伴的苦難，無論是人類與否，都造

成對上帝的苦難。這觀點有很強的聖經根據。對他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無論他們是人類與否，都是不必要地將痛苦加於他們和上帝身上。為到減少這些痛楚和苦難作出委身，絕非情緒化的表現。

由於近來更正教的領導層擺脫了人類中心主義，但仍未明顯地表現出對個體動物受苦的關注，我並未提出這作為一個在更正教神學和深層生態學之間的矛盾。雖然如此，當中的分別，在更正教神學的進程形式中比起在別處，更清楚地顯露出來，但這卻是隱含在一般的更正教思想中。

更正教強調他者的主體性，如果一個人與另外一個人相關，另一個人不是原初地被理解為那個出現在那人的感官經驗中的他者，而是作為一部分地獨立的經驗主體——作為一個你 (thou)。你的感覺如何是重要的*。因此，使另一個別的人受不必要之痛苦和苦難，是自明地錯誤的。縱使那裏有發展自神聖無情 (divine impassibility) 的傳統教義的理論上的課題，絕大部分的更正教徒都從聖經中明白到，這樣的痛苦和苦難是上帝所關注的。

當更正教徒從聖經中確認，上帝所關心的並不單單只是人類，自會出現一種伸延，就是從關注於個別的人的受苦，伸延到對那些上帝所關心的其他眾受造物。的確，除非這個伸延變得明顯，否則我們仍將懷疑那種對人類中心的思想的執着，仍未被徹底打破。此外，百萬計的更正教徒已推行這改動一段很長的日子，又提供很多支持，甚至組織的領導也委身於改善家畜的生活條件。

---

* 這兩句中的「你」(thou)，顯然暗引馬丁．布伯《我與你》(*Ich und Du*，英譯*I and thou*) 中所論，不宜譯作叫人多心的「您」(Sie / You或Ye)。——編注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如美國人道會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的組織，由一位更正教的前牧師所領導，已經將他們的關注和委身擴展至超過了對家畜的人道對待。他們現在將關注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處境中。就正如對個別鄰舍的關心已經使眾多更正教徒為此進行系統分析；因此，對個別非人類的動物的關心，亦正導致這樣的系統分析。至今，我仍未看見在深層生態學的一邊有一種相似的改動，轉向對動物受苦的同情關心。

我們同樣發現，如此強烈地反對人類中心主義，以至將個別人類的獨特價值減至最少，也是危險的。對於那些受教於聖經的人來說，個人對於上帝是一份特別的珍寶，而其他人也應以這種態度來對待人類。為破壞性的人類中心主義而悔改，並不表示我們可以減低對有需要的人類鄰舍敏銳的關注。

總結

要與深層生態學達成基本一致的這種種先決條件，經常導致深層生態學家們拒絕我們的立場，並認為這仍然是以人類為中心，但這同樣是定義的問題。作為一個更正教的進程神學家，我在以下的幾方面反對人類中心主義：

1) 上帝關心所有受造物，不只是人類，並且人類應該跟隨這種普世性的關懷。
2) 其他受造物的價值不是被限制於他們對我們的價值。他們對於上帝、對於彼此之間的以至對於他們自己的價值，都是重要的。人類的價值有時候是應該為了他者的緣故而被犧牲。
3) 現實 (reality)，是在自己裏面的，而不是限制於它如何被人類所經驗。

4) 個別的人以至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都不是自閉自足 (self-contained) 的。我在物質和心理上，都嵌入在一個包括其他眾受造物的母體 (matrix) 中。我們與它們的關係是內在於我們的存有。無論何處有破壞和失去，都會於我有損。

作為一個進程更正教神學家，我在以下幾個方面保留那些深層生態學家們所稱的人類中心主義：

1) 在所有可能性中，個別的人類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內在價值的載體 (embodiments)。
2) 人類對其他的受造物負有一種責任，這種責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不為其他物種所分擔的。大部分都是在乎我們如何履行這責任，而這意味着我們應該承認和確認這種責任，並且也應該為到過去履行主權的方式而悔改。
3) 為了妥善地去履行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需對其他眾受造物的相對價值作出判斷。我們知道這些都是人類的判斷，而這認知應該令我們額外留心，避免以人類為中心地作判斷。與此同時，要作這些或任何其他的判斷，又是不得不以人類獨特的經驗為基礎的。

這篇論文中的重點是落在更正教神學家、包括更正教進程神學家所不同意的那些通常被稱為深層生態學的地方。但是從那些嘗試去促進更正教的實踐、使之趕上最佳的更正教思想的更正教徒的觀點來看，深層生態學家的工作應該得到稱頌，而他們的領導也應獲得答謝。我們更正教徒必須從自己的傳統中作出我們自己的思考。但是在作這些思考中，我們受惠於那些站在我們群體以外的人給我們的刺激，就是那些指出我們錯處的人，和那些至少在某些課題上超越我們前頭、給我們提供另類選擇的人。

同樣重要的是承認，在更廣闊的場景中，我們之間的

相異比起之間的相同是次要的。我們之間未能融合力量；對此，我們之間的差異是太過大了。但在人類今天所要迫切面對的大部分事件中，我們能夠和應該學習去欣賞對方的種種貢獻。

此外，在很多陣線上，我們是可以一起工作的。沒有任何一個關心地球命運的團體有能力去拯救它。即使我們盡量在共同之處一起工作，集中我們的資源去完成那些最需要完成的工作，成功與否，仍不確定。但非常確定的是，假如我們墮入學術上無止境的辯論的習慣中，而不是在我們的不同中互相欣賞、在可能之處支持彼此所作的努力，那些聯合起來的剝削力量將會繼續強暴我們的地球。